

空中英豪

美国第八航空队对纳粹德国的空中之战

MASTERS OF THE AIR

AMERICA'S BOMBER BOYS WHO FOUGHT
THE AIR WAR AGAINST NAZI GERMA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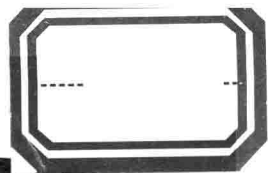
【美】唐纳德·L·米勒 著 / 小小冰人 译

中卷



人民日报出版社

指文图书®



空中英豪

美国第八航空队对纳粹德国的空中之战

MASTERS OF THE
AIR

AMERICA'S BOMBER BOYS WHO FOUGHT
THE AIR WAR AGAINST NAZI GERMANY

【美】唐纳德·L·米勒 著
小小冰人 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第七章

地狱的钟声

今天不会出现太阳；
天空对我们的军队蹙起眉头，露出怒容。

——威廉·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五幕，第三场）

1943年6月25日，索普-阿博茨

午夜刚过，肯尼斯·莱蒙斯获悉：就在今天，第100大队将发起他们的首次打击。

凌晨3点，机组人员被唤醒前，机械师们便已待在停机坪处。而负责准备炸弹和武器的人员，甚至更早便开始了工作。命令下达后没过几分钟，他们便在床铺上被唤醒，随即来到炸弹仓库，开始装载当天任务配发的500和1000磅炸弹，这些炸弹整齐地堆成三角形，摆放在由围墙封闭的一片区域内，这里被他们称作“炸弹城”。这些炸弹被放上长而低矮的拖车，送至飞机旁，再用手动绞盘吊入空空的机腹内，挂在弹仓的水平支架上。军械士塞入引信后，他们会在每颗炸弹的保险装置上插入一根开口销，以防止炸弹尾部的螺旋桨发生旋转——螺旋桨开始旋转，炸弹便处于击发状态。这种做法是防止搬运炸弹时发生爆炸。

这是项危险的工作，特别是处理炸弹的人如果在炸弹送上飞机前便装上引信的话。里奇维尔，第381轰炸机大队的驻地（该大队与第100大队同时到达英国），11颗炸弹在一架“空中堡垒”下发生爆炸。“听见爆炸声，我匆匆赶至现场，顿时被惊呆了。”大队的牧师詹姆斯·古德·布朗在他的日记中写道。¹一架“空中堡垒”和23个人只剩下金属和骨头碎片。

炸弹在索普-阿博茨被装载时，军械专家们将装满点50子弹弹链的木箱拖入飞机，每挺机枪旁都放上一箱子子弹。然后，他们会检查动力操纵的炮塔，将其分解开，确保一切正常。机组人员的性命依赖于他们的检查。

等他们的工作完成后，地勤人员（每架飞机三个人，一名地勤组长和他的两名助手）便开始接手，对飞机进行最后的机械检查：发动机、液压装置、制动、轮胎和供氧系统。最费体力的工作是用手转动螺旋桨叶片以启动发动机，并排除积存在气缸内的任何油品。然后，地勤主管会钻入驾驶舱，启动发动机，对其加以测试，同时检查飞机敏感的电气和液压功能。如果一切合格，他便关闭引擎，将油箱加满。地勤人员从未被告知这些飞机将飞往何处。但他们知道满满的油箱对机组人员而言，意味着漫长而又危险的一天。

射手们到达时，地勤人员刚刚完成他们的工作，此时离起飞还有一个小时左右。他们将自己的机枪装好，这些机枪通常存放在停机坪旁的武器库内，裹着浸了油的布，以防生锈。这层厚厚的油必须去除，在高海拔区域，它可能会吸收水分，造成机枪被冻结。

四名飞官结束任务简报赶到时，机长会给大家分发急救包，并在地勤主管的陪同下“绕机一周”，进行起飞前最后的目测检查。他们按照长长的检查清单环绕飞机时，射手们从带至停机坪、装有拉链的装备袋中取出他们的电加热飞行服穿上。

大多数射手已在飞行装备室将笨重的飞行服穿好，但也有些人喜欢到飞机旁再穿上。他们穿戴着可脱式降落伞背带、充气式救生衣、羊毛里衬的皮夹克和裤子、沉重的皮飞行靴和带里衬的皮手套。射手们还戴着内衬羊毛的飞行

帽，一些机组人员还拥有钢盔和防弹衣，进入敌方领空后，他们便会穿戴上。每个军官配有一支点45口径的柯尔特自动手枪，大多数人都带着护身符：圣克里斯托弗徽章、妻子或女友的来信、好运袜或幸运围巾，总之是能抵御战争恶魔的一切。

大多数机组成员通过机身后部舱门进入轰炸机内，这扇舱门位于腰部射手一个敞开的舷窗后。一些军官更喜欢从机头处的舱门钻进去，这个较为运动化、类似引体向上的动作把他们带入各自的岗位。整个机组登机后，驾驶员便打开他那侧的舷窗，喊道：“一切就绪。”随即启动一号引擎的螺旋桨。“伴随着巨大的噗噗声，‘莱特旋风’引擎启动了，”肯尼斯·莱蒙斯回忆起第100大队执行首次作战任务的那个早晨，“从左侧的外部引擎开始，一台接一台，它们轰鸣起来，向后方喷吐出滚滚浓烟。这些引擎喷出的反向气流能轻而易举地把人吹翻。”²

飞行员示意地勤人员将轮挡移开，以便让飞机滑向环形道。地勤人员就像警惕的母亲，陪着他们的“宝宝”走上主跑道。飞行员身处高高的机鼻部上方，无法看见前方的地面，所以需要地勤人员的引导。停在跑道末端的一辆厢式货车上射出一发绿色信号弹，几分钟内，第100大队起飞赶往不来梅。轰炸机消失进低矮、浓密的云层时，基地上悄无声息。将停机坪上的工具收拾干净后，地勤人员赶去食堂，吃罢早饭便一头倒在宿舍的床上。但由于自己照料的那些飞机正处在危险中，所以他们很难入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几个小时后，一些人玩起了纸牌或骰子，另一些人给家里写信，还有些人溜到村里喝上一品脱啤酒，或是找个年轻的英国战争寡妇调调情。肯尼斯·莱蒙斯说：“直到他们平安返回，我们才会彻底放松下来。”³

临近中午前一个小时，消息传来：他们正在返航。基地里的人涌出厨房和办公室、维修间和宿舍，几分钟内，所有地勤人员都来到停机线处，准备“数一数返航的飞机”。大约11点15分，返航的飞机出现在索普-阿博茨上空，开始一次一架地降落。14架轰炸机返回，可应该是17架。失踪飞机的地

勤人员等候在跑道旁，期盼着奇迹的出现。待他们获悉三架轰炸机已被正式列入失踪名单后，他们收拾好自己的设备，默默地走回散布在四周的帐篷里。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清晨，他们曾与之握手的30个人，就此消失了。

现在没时间哀悼。作为一名地勤主管，肯尼斯·莱蒙斯管理着5架轰炸机和15名机械师，他们必须让这些飞机为次日的行动做好准备。机械师将堵塞的油底壳清理干净，检查火花塞、汽缸、增压器和电力线路。待“供油者”驾驶着巨大的油罐车到来后，机械师便爬上机翼，打开注油盖，将燃油注入自动密封式油箱，每架“空中堡垒”上有六个这样的油箱。后期型号的B-17上，这些油箱能容纳2800加仑汽油，几乎是飞机起飞重量的四分之一。这群机械人员忙碌时，不忘进行友好的调侃，钣金人员修补着飞机的作战损伤，用有嘈杂声的气枪射出的铆钉给破损处打上补丁。主结构损坏通常会交由航空队的特殊维修厂加以修理，但在繁忙的战斗中，肯尼斯·莱蒙斯的组员们有时会自行更换螺旋桨或拆下机翼更换被射穿的油箱。这种工作往往会持续至深夜。

机械师们工作在一个永远是泥泞和油污的环境中。衣服被弄得污秽不堪后，一些人使用一大盆汽油清洗他们的工作服和A类军装常服，并在宿舍外拉起的衣绳上晾干。航空队人员离开基地外出必须穿上军礼服，但如果一名士兵在自己的A类常服晾干前便得到外出许可，他情愿身穿湿军装出去，也不愿独自在基地里消磨一晚。莱蒙斯说：“这些人点烟时居然没发生爆炸，这可真是奇迹。”*⁴

他们的工作毫无荣耀可言，几乎得不到什么赞誉；没人会为更换了火花塞而发你枚勋章。机械师们也没有紧张刺激的故事可供他们在酒吧内吹嘘。但基地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以自己对飞机的维护来帮助打赢这场战争。纳粹开始这场机械化战争（快速行动的坦克和飞机）时，他们忘记了美国是“一个机械化国家”，这个国家的孩子是“玩着机械拼装玩具长大的”，⁵而像莱蒙

* 译注：A类常服指的是美军士兵的上衣、长裤和衬衫，而B类常服不包括外套，C类则指工作服。

斯这样的农场孩子，16岁前就会修理家里的雪佛兰汽车。《扬基》杂志的一名记者写道，就是这些修理轰炸机的“机械战士”，将把那些“纳粹超人”打回到他们的啤酒窖里。

机组人员在他们的25次作战飞行任务中经常更换，许多人在战斗中牺牲，地勤人员（他们的服役期是整场战争）不可能认识他们中的每一个。但是，莱蒙斯说：“我们喜欢他们，他们是为我们去打这场战争的。”⁶

战斗和疯狂

带着军纪不佳的名声来到英国后，第100轰炸机大队便处于柯蒂斯·李梅上校冷淡的监督下。李梅来到索普-阿博茨基地进行视察时，一名粗暴的下士驾驶着卡车，拖着一辆装炸弹的拖车，从李梅身旁高速驶过，差点撞上他。几分钟后，一名地勤组长驾驶的吉普车从侧面撞上了上校的指挥车。李梅还发现该大队的宿舍脏乱不堪，床铺没有收拾，空酒瓶胡乱扔在地上，未洗的衣服堆在一起，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他让盖尔·克莱文来见自己，因为他曾听说克莱文和约翰·伊根是整个大队“军纪不整”的根源⁷，但一名中士却告诉他，中队长克莱文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好脾气的大队长尼尔·哈丁上校曾是西点军校橄榄球队的教练，他跟那些飞行员一起喝酒，并未在基地内严肃军纪。⁸随着任务日渐艰巨，他认为酗酒和斗殴是可接受的宣泄方式。他会说，他的部下都是“血肉之躯”，⁹而不是毫无感情的钢铁。亲眼目睹了朋友在爆炸的飞机中牺牲后，他们应该被允许偶尔疯狂一下。

但是，疯狂也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至少有一次促成了一个出色的决定。当年夏末，哈里·罗斯比在混战中无法透过厚厚的云层瞄准他的主目标，两个备选目标同样如此。于是，中队打算轰炸一个“临时目标”，这是航空队对随便轰炸某个地方的委婉说法。透过云层中的空隙，罗斯比发现了一

座大型德国城市，他向驾驶员打了个OK的手势。就在炸弹舱门的开启声传来之际，他低头看看航图，发现这座城市是波恩。

他立即按下麦克风按钮：“来自领航员的报告，我有另一个目标。我们不能轰炸波恩。”¹⁰

“机长问领航员，为什么不能？”

“那是贝多芬上学的地方。”

克罗斯比碰巧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发起空袭的前一天夜间，他在宿舍里播放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从唱片的封套上看来的。伴随着交响曲的前奏，他思索着深入德国的空袭任务。唱片封套还告诉他，波恩是一座大学城，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机组人员爆发出一阵“噢，妈的”的叫声，驾驶员在克罗斯比的引导下飞离，另外63架“空中堡垒”也从波恩上空飞过，其中有些飞机的炸弹舱门还敞开着。几分钟后，他们在鲁尔发现了一个铁路编组场，随即将其摧毁。

汉堡

汉堡就没这么幸运了。这座港口城市有近200万人口，几乎被历史上首次人为大火夷为平地。“轰炸机”哈里斯的部下负责实施破坏，但第八航空队也功不可没。这是持续的美国轰炸攻势首次越过莱茵河展开行动的一部分，是艾拉·埃克筹划近半年的夏季攻势的开端。它开始于1943年7月的最后一周，航空队称之为“突袭周”。

“突袭周”是因天气的突然转变而促成的。第八航空队的行动被笼罩在德国目标区上空长达三个月之久的多云气候所阻。7月24日，天空突然放晴，第八航空队加入皇家空军，参与到被航空队官方史学家称为“截止到当时，空战史上最猛烈、最连续的进攻”¹¹中。这是“直瞄射击”真正的开始。

这一周，哈里斯的“兰开斯特”、“哈利法克斯”、“斯特林”和“惠灵

顿”向德国投下了数量创纪录的炸弹，第八航空队也在白昼空袭中创造出自己的投弹吨数记录，他们的轰炸机比过去更深地进入到德国境内。这一周开始的时候，第八航空队轰炸了挪威的经济目标，这是迄今为止他们飞行时间最长的任务。接下来的两天，7月25和26日，埃克的轰炸机与皇家空军联手，协调一致地对汉堡实施了白天和夜间轰炸，汉堡是欧洲最大的港口，也是德国的第二大城市。

第八航空队将目标集中于汉堡的飞机发动机厂以及巨大的潜艇制造坞，而哈里斯的人则以一连串可怕的夜间空袭将市中心夷为平地。7月24/25日的夜间，皇家空军令汉堡燃起猛烈的大火，第二天，第八航空队飞赴汉堡上空时，火焰仍在燃烧。“烟雾像一片巨大的雷雨云那样笼罩着城市，透过硝烟能看见红盘子似的太阳，”一名德国目击者写道，“现在是早上8点，可这里几乎漆黑一片，就像深夜。”¹²两天后，更糟糕的情况出现了。

7月27日，汉堡，一个美丽的夏夜。整座城市一片寂静，没有高射炮声，也没有警报声。乐观的猜测认为，也许这场灾难已经结束。随后，凌晨1点，人们听见英国轰炸机（有700多架）逼近了。“突然间，一阵火雨从天而降，”汉堡的一名消防队员回忆道，“空气中实实在在地充满了火焰……然后，一场风暴开始了，街上发出一种凄厉的咆哮。它变为一股飓风，所以我们不得不放弃了救火的所有希望。”¹³汉堡已被皇家空军轰炸过无数次，它拥有高射炮和战斗机构成的强大的防空网，但英国人这次使用了一种巧妙的防御战术，代号“窗口”。成千上万束类似于圣诞树上金属丝的铝箔条，从飞机上投下，在空中和地面防御者的雷达屏幕上形成一片暴风雪似的虚假回波。

德国这片地区天气异常的炎热、干燥，为这座城市掀起一场猛烈的火焰飓风提供了近乎完美的大气条件。空袭开始后，20分钟内，一股湍急、滚烫的气流窜入夜空2.5英里之高。滚烫的空气以每小时150多英里的速度冲过城市，令惊恐的市民仓促逃入防空洞中，他们的衬衫和裙子像火把那样燃烧着。贪婪的火焰吸食着空气中的氧气，防空洞内，数千人窒息身亡。其他遇难者的尸体在辐射热的烘烤下化为灰烬。“这就像他们被放置在一个火葬场，这的确

是每个防空洞所证实的，”一份德国的秘密报告中这样写道，“幸运的是那些跳入运河和水渠，保持游动或站立在没至脖颈的水中一连几个小时，直到炙热渐渐消退的人。”¹⁴但一名目击者说，当晚晚些时候，工业运河中含油的河水也燃烧起来，困在水里的人“精神失控”了。¹⁵

被火棒（这是一种小型、极具杀伤力的燃烧弹）击中的防空洞内，孩子们“像动物那样叫喊着”，一名目击者报告道，“我身边的一位妇女掏出一把刀，将她孩子的手腕割开，随后又切了自己的手腕，她滑倒在孩子的身上，喊叫着：‘宝贝，亲爱的，我们很快就能见到爸爸了。’”¹⁶

火灾遇难者的脑浆从他们爆裂的太阳穴中流出，瘦小的孩子“像油炸鳗鱼似的倒在人行道上”，一名目击者说，“即便在死后，他们仍表露出他们是如何遭受这一切的迹象——他们的手和胳膊向外伸出，仿佛要在这无情的热浪中保护自己”。幸存者发现了死去的家人，也发现他们的一切都已消失——家、照片以及所有的财产。“没有任何可供他们记忆的东西。”¹⁷

皇家空军的最后一次空袭于8月2日结束后，救援人员被召来，以清理散落着烧焦的尸体的街道。“我们将30—35具尸体逐一堆砌起来，”当地一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汇报说，“我们把所有的尸体堆起来，如果你在两三天后从那里经过，必须用玻璃纸挡在眼前，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在冒烟。空气凝滞不动。在那三四天里，我们这里没有一丝阳光，完全是一片黑暗……尸体被堆在房屋的入口处。你从一旁经过时，只能看见一堆脚，有些死者光着脚，还有些死者的鞋底已被烧焦。这些尸体根本无法辨认。我们会从地下室中挖出全家人的尸体……这些尸体可被放入一个浴缸里。就连成年人的尸体也很小，他们已被热量彻底木乃伊化、烧毁并融合在一起。”¹⁸

在废墟周围捡东西的劫掠者被警察和盖世太保的密探就地枪毙。幸存者逃离倒塌的掩体，身上仍冒着火，他们“冲入相邻的防空洞，结果却被射杀，以免将火焰传播至别处”，汉堡的一名妇女报告说。¹⁹

首次由轰炸造成的火焰风暴，是个故意行为，由高炸弹和燃烧弹这种致

命的组合来实现。随后，4000磅炸弹又被投入这片地狱中，在道路上炸出弹坑，以阻止消防人员采取行动。“一股恐怖浪潮从这座遭受苦难的城市辐射而出，迅速蔓延了整个德国。火灾骇人听闻的详情被四处传播，一连数日，那里的火光在120英里外都能看见，”德国空军的一名指挥官报告道，“来自汉堡的恐怖消息迅速蔓延至帝国最偏远的乡村。”²⁰逃离汉堡的100多万居民携带着可怕的详情，他们中的许多人惊慌失措。

一名德国家庭主妇跟随其他幸存者搭乘火车赶往柏林时，目睹了超出人类信仰的一幕。一名年轻女子，她的脸被烟灰熏黑，双眼凝视着窗外，在一种恍惚状态下一动不动。她的膝盖上放着个小小的手提箱。另一名失去所有家当的妇女转过身，冷冷地对她说道：“嗯，不管怎样，您还设法抢救出一些东西，已经比我们这些人幸运多了，不是吗？”²¹

年轻女子承认确实如此，她说：“我抢救出的是对我来说最宝贵的东西，您想看看吗？”

她打开手提箱，里面摆着一具烧焦的孩子的尸体。她发出歇斯底里的大笑：“这是我的女儿。她是不是很可爱，长长的卷发，蓝色的眼睛，不是吗……去年她长大了许多，她才12岁。可现在，她萎缩成这么一点点，我甚至能把她放在手提箱里。”

这种苦难和伤亡在轰炸战中前所未见。废墟中发现了45000具尸体，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据汉堡消防部门统计，至少还有10000多具尸体被深埋在废墟下，或是在烈火中被烧毁。这座城市的60%（这片区域大约为13平方英里）被彻底焚毁，留下成千上万名无家可归者。²²十天内，在汉堡身亡的平民，数量超过整个闪电战期间英国国内的平民伤亡数。皇家空军的损失也很惨重：87架飞机。但“轰炸机”哈里斯对“蛾摩拉城行动”（这是本次空袭行动非常贴切的代号）深感满意，他的部下几乎摧毁了整座城市。*

* 译注：《圣经》中，因其居民罪恶深重而被神毁灭的古城，一座是索多玛，另一座是蛾摩拉。

弗里茨·雷克，这位对纳粹口诛笔伐的德国作家最终会被关入达豪集中营，在那里，他彻底沉默了。汉堡遭遇轰炸后，他在日记中绝望地写道：“没有可能……回到昨天的世界中。”²³德国自食其果，将承受其历史上从未遭受过的苦难。

皇家空军深深地震动了纳粹领导层，这在战争中还是首次。“心理战……已到达最为关键的时刻，”德国战斗机总监阿道夫·加兰德写道，“斯大林格勒很糟糕，但汉堡并非位于数百英里外的伏尔加河，而是在易北河上，就在德国的腹地。”²⁴

“汉堡……令我万分惊恐，”希特勒的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写道，“我曾在7月29日召开的中央计划局会议上指出：‘如果轰炸以现在的规模继续进行下去，三个月内，我们目前仍在讨论的许多问题就将不复存在……我们可能就得召开中央计划局的结束会议了。’”²⁵三天后，施佩尔警告希特勒（他拒绝去汉堡视察，甚至不肯接见在受灾城市中表现英勇的救灾人员所组成的代表团）：“如果一系列这种规模的空袭扩大到另外六个大城市，德国的军备生产就将彻底停止。”希特勒不为所动，他对施佩尔说：“您会使一切恢复正常的。”²⁶

实际上，哈里斯大大低估了德国经济的恢复能力。五个月内，汉堡恢复了80%的生产能力。作为一名组织天才，施佩尔领导了这场复苏，但汉堡之所以再次成为纳粹战时生产中心，主要是因为它再也未遭受到如此猛烈的空袭。哈里斯将重点转向其他城市，尤其是柏林。未来的几个月里，英国人的轰炸“采用了几乎是漫无目的的方式，巨大的瓦砾堆积如山，但由于时间和空间太过分散，以至于无法对德国人的士气或生产形成决定性打击”，历史学家迈克尔·谢里写道。“这些轰炸轻而易举地证明，有些人将空中力量的破坏性与其决定性等同起来。”²⁷出于对德国空军大规模报复的担心，哈里斯发现了一种更好的方式，就像历史学家马克斯·黑斯廷斯所说的那样：“间隔几周后再对同一个目标发起打击，而不是立即回来。”²⁸

对汉堡的空袭暴露出昼夜不停轰炸的欺诈性，这是“直瞄射击”的中心

思想。第八航空队独自策划的空袭行动太过微小，无法对汉堡的码头、飞机制造厂以及潜艇生产设施造成永久性破坏。皇家空军在这片地狱上制造出翻滚的浓烟，妨碍了美军机组人员确定其精确目标的尝试。

7月28日，第八航空队的机枪手杰克·诺威，他的“空中堡垒”从汉堡上空飞过，恶劣的天气使他们无法找到当天的主要目标。“即便在17000英尺高度，热浪依然相当强烈，我的脸发出阵阵刺痛，仿佛正站在一个敞开式壁炉前。”²⁹汉堡遇难的46000人中，死于美国炸弹的受害者只占很小的比例，但诺威和第96轰炸机大队其他一些机组人员仍对第八航空队参与进这场被他们视作滥杀无辜的行动而深感震惊。诺威后来写道：“我忍不住想象起下方的孩子们倒下的情形。”³⁰但即便是诺威这种沉默的反对者，依然坚信其事业的正确性。“疯狂的独裁者”纯属自作自受，³¹另外，对支持他的德国民众来说，将不得不接受甚至包括无辜者丧生的后果。而这些飞行员从未认为自己是无辜者，他们同样遭受着苦难。

“瑞德” 摩根

对“瑞德”摩根及其机组人员来说，“突袭周”期间轰炸汉诺威的行动是任何一个十人机组都能承担的任务。第92轰炸机大队的约翰·摩根中尉是一架B-17的副驾驶，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急于投身战争的他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便加入到加拿大皇家空军中。这需要鼓起勇气。而1943年7月26日在汉诺威上空的行为，使他成为了第八航空队的一个传奇。

飞往目标的途中，他们那架“空中堡垒”遭到重创，驾驶员罗伯特·坎贝尔身负重伤。神志不清的坎贝尔，后脑勺被一发20毫米炮弹切掉，瘫倒在控制杆上，胳膊死死地搂着它。摩根接手后的两个小时里，坎贝尔本能地殴打着手上的控制杆，试图控制这架摇摆不定的飞机。摩根很容易结束坎贝尔的性命，只需摘掉他的氧气面罩即可，但他想把自己的朋友活着带回去。飞机上的通讯系统

被打坏，他无法呼叫援助。实际上，他也很难得到帮助。顶部炮塔射手，泰尔·C·韦弗上士的胳膊刚刚被炮弹炸断，此刻倒在机舱冰冷的地板上昏迷不醒。领航员基斯·考斯科中尉从脖子上扯下白色的围巾，将韦弗的断臂包扎起来，但由于断臂处太靠近肩膀，考斯科必须用上很大的气力来为他止血。“我想给他注射吗啡，”考斯科后来告诉安迪·鲁尼，“但针头弯了，我无法将吗啡注射进去。”³²

轰炸机离英国足有四小时航程，考斯科知道韦弗无法支撑那么久。于是，他将一具降落伞挂在韦弗的背带上，又把开伞的拉索塞入他尚存的那只手中，然后压低他的身子，让他钻出了逃生舱门。考斯科希望零度以下的严寒能为他的伤口止血，但愿德国医生能及时发现他，并挽救他的性命。就在考斯科照料韦弗之际，摩根不认识的尾部射手，忽然间不省人事。氧气管被炮火切断了。

摩根，这位6英尺2英寸的壮汉，一只手操纵着飞机，另一只手抵挡着重垂死的飞行员的攻击，就这样驾驶着“露丝Ⅱ”号飞往目标区，并轰炸了汉诺威的一个橡胶厂。后来，在考斯科和另一名恢复过来的射手的帮助下，摩根将坎贝尔从座椅上拉开，把他放在驾驶舱的地上，又给他盖上一条毛毯。要是有时间的话，他们会为他祈祷的。

摩根驾驶着这架“空中堡垒”在诺福克一个皇家空军的基地紧急降落，此时，机上的油量表已近零点，前挡风玻璃破裂得太过严重，他不得不依靠侧面的舷窗引导飞机着陆。过了一个多小时左右，驾驶员坎贝尔伤重不治。当年12月，来自阿拉巴马州江景的泰尔·韦弗上士从奥地利的17B战俘营给他的一位朋友写了封信，告诉他自己“没事”。³³几天后，摩根获得了荣誉勋章。他觉得这枚勋章应该属于考斯科。*

* 译注：摩根获得荣誉勋章后，埃克将军指示他不必再参加作战飞行，但摩根认为，既然战争没有结束，自己就不能停止飞行。终于，1944年3月6日，他的B-17被击落，摩根进入德军战俘营，一直待到欧洲战事结束。朝鲜战争期间，摩根担任美国空军部长副助理，并被召回现役。在美国，他被视作一个真正的英雄。

低空突袭者

尽管天气不错，但艾拉·埃克将军还是于7月31日下令暂停行动。在近两个星期的时间里，第八航空队不会恢复其全面攻势。“突袭周”期间，他们损失了97架“空中堡垒”，占投入行动的飞机总数的10%，飞行员也已疲惫不堪，他们需要时间来恢复。埃克还需要获得轰炸机的补充，以执行一次绝密突袭，该行动已筹划了近半年时间。

这个行动是对施韦因富特滚珠轴承厂的空袭，而这些工厂被德国空军的一名指挥官称为“德国工业的致命要害”³⁴。没有哪部战争机器离得开减少摩擦的轴承，而施韦因富特，这座处在法兰克福东南方，位于美因河畔，拥有43000名居民的漂亮小镇，设有三座轴承厂，其产量占到德国滚珠轴承总产量的57%。这将是一场双管齐下的袭击，另一支轰炸机编队将对雷根斯堡（也在巴伐利亚）的一个梅塞斯密特组装厂实施空袭，那座工厂生产了德国30%的单引擎战斗机。突袭雷根斯堡的轰炸机编队随后将飞往北非的美军基地，而轰炸施韦因富特的编队则返回英国。这场“穿梭”行动将是第八航空队到目前为止对德国领空最深的一次渗透，这些轰炸机在跨越德国边境时便不再有己方战斗机护航。但通过对敌防空体系的分散和混淆，这场双重打击将使两支编队得以实施猛烈的轰炸，而不至于遭受到过大的损失。计划就是这样。

埃克不得不在三个“解放者”大队缺席的情况下执行这一任务。6月份时，这三个大队已被派往刚刚被征服的利比亚沙漠，为另一项绝密行动进行训练，该行动针对的是纳粹的另一处“要害”：位于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庞大的炼油厂，希特勒获得的原油，60%来源于此。这场针对被丘吉尔称为“德国力量核心”³⁵的突袭计划于1943年8月1日发起，就在埃克将他那些“空中堡垒”停飞的一天后。

这两场行动都将承担实施致命一击的重任，表明阿诺德将军对欧洲空战的进展越来越不耐烦。正如柯蒂斯·李梅后来所说的那样：“（这些行

动是)计划与情报部门的那些知识分子苦思冥想,设法找到一种赢得欧洲战争的简单办法的结果。这就像是在寻找不老泉——没有这种东西,从来就没有。”³⁶1942年12月,阿诺德召集起的一个文职专家组提出建议,将三个主要目标定为:石油、滚珠轴承和飞机制造厂。任务分析委员会(COA)中,成员们的身份个个引人注目。其中包括J·P·摩根公司的华尔街金融家托马斯·W·拉蒙特;小伊莱休·鲁特,他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国务卿的儿子;律师乔治·W·波尔;普林斯顿大学的军事历史学家爱德华·米德·厄尔;法官约翰·马歇尔·哈伦,后来他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另外还有吉多·R·佩雷拉上校,他离开自己声望卓著的波士顿律师事务所,来到华盛顿为阿诺德效力。次年3月,经过对德国经济的仔细研究,委员会敦促第八航空队将重点放在一系列经过选择的目标体系上。“给少数几个真正必要的产业或服务项目造成高度破坏,其效果要好于给许多行业造成轻微破坏。”“以无情的决心”对那些“薄弱环节”实施反复打击,美国航空队便能如其所愿地“瘫痪轴心国在西线付出的战争努力”,特别是德国空军,他们是石油和滚珠轴承的大用户。³⁷

对施韦因富特和雷根斯堡的空袭是一场冒险,而突袭普洛耶什蒂则是自杀行为。

德国是一个没有石油重要来源的国家,他们带着航空和车用汽油微薄的储备投入战争,从未从这种危险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但他们通过征服和创造这两种方式来弥补其自然资源的缺乏。到1943年,德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合成油工业,以及从仆从国(主要是罗马尼亚)进口来的大量石油。罗马尼亚的炼油厂对德国的战争努力至关重要,因为德军未能夺取高加索地区俄国人的油田,而这正是德国入侵苏联的主要目标之一。³⁸

德国的合成油厂坐落在帝国腹地,不仅被加以巧妙的伪装,还得到严密的防卫。但盟军征服北非后,从沙漠中起飞的远程轰炸机已经能到达位于南喀

尔巴阡山脚下一片广阔平原上，首都布达佩斯北面35英里处的普洛耶什蒂，这些轰炸机曾将埃尔温·隆美尔逐出利比亚的沙海。盟军获得的地面情报表明，普洛耶什蒂的防御并不严密，主要由罗马尼亚人守卫，他们藐视他们的德国主子，不太可能实施顽强的抵抗。据一名被俘的罗马尼亚飞行员交待，普洛耶什蒂是欧洲防御最森严的目标之一。但盟军没有对该目标实施侦察飞行，他们担心引起敌人的警觉。这是战争期间最大的情报失误之一。

空袭普洛耶什蒂的行动代号为“海啸”，³⁹这是阿诺德身边的一名顾问，雅各布·E·斯玛特上校想出的名字。行动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和准确的时机。德国人知道，美国航空队完全致力于高空精确轰炸，美国人在1942年春季实施了一场小规模、不太成功的高空轰炸后，出于这个考虑的德国人便在普洛耶什蒂构建起他们的防御。斯玛特上校提议低空进入，在树梢的高度上，以高达200英里的时速强行突破。实施空袭的飞机将保持无线电静默，飞越宽阔的地中海以及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崎岖的山脉，径直赶往目标区。翻越过9000英尺高的品都斯山脉后，他们将下降至超低空，在多瑙河平原上呼啸而过，同时到达并在目标上空集结，彻底打垮对方措手不及的防御，将普洛耶什蒂变成一片沸腾的火海。

在敌雷达探测范围外实施低空飞行，轰炸机能在200—800英尺的高度上以极高的精确度命中目标，并使敌高射炮手和战斗机难以发现并命中目标。这种方式还能减少平民的伤亡，并使受损的轰炸机获得更好的迫降机会。

执行这次任务，“空中堡垒”的航程不够——往返行程达到前所未有的2400英里，所以斯玛特不得不使用“解放者”，他知道，这将使此次行动更加危险。操作B-24非常困难（光是移动操纵杆便需要付出极大的体力），对这次任务所要求的密集编队飞行和近乎残忍的空中敏捷性而言，B-24的弱点难以克服。另外，这款轰炸机在空气动力性上更为先进的机翼，也就是所谓的“戴维斯机翼”，其弹性也不如B-17。这次行动中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这些轰炸机将直接飞入敌地面炮兵的瞄准器射程中。